

“让文化回到生活”

——读王蒙新著《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 □袁益民

一位作家，从青春年华到耄耋光阴，一直保持高质量、大能量的创作状态和探索势头，放眼全球，恐怕也难有几人，而中国当代作家王蒙正应位列其中，他的作品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体现出旺盛、持久、深邃的面貌。

王蒙先生的人生，是怎么做到如此坚韧、如此峭拔、如此英特迈往的呢？他的新著《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直接给出了答案：他得益于中华古典文化精髓的启发、滋养和支撑，先人的智慧打通了他的经脉，塑造了他的骨格。

这本不是很厚的书，内容却非常广阔：生、死、天地、人、命运、仁义、美德、权力、治理、礼法、软硬实力、王道、无为、修身、君子、劝学、修养、境界、风度、理想、信仰、家国。同时，涉猎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门类，包括哲学、历史、伦理、社会、生命、理国、治学等等。但王蒙的行文风格不是《中国社会科学》《古典文学知识》《文史哲》之类，也不是各大院校的学报上的厚重论文，而是小说家言的“王蒙腔调”。用王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尽量把谈中华传统变成谈古代的事，谈很遥远的以前的事，而是好像我们谈家常一样，好像我们一块交流生活的经验一样”。

对高大上的经典进行接地气的诠释，不是王蒙的全部任务，甚至只是本书的一个基本点。王蒙在本书的序章《文化圆满人生》中开宗明义：“文化的活力在于它的有效性……这本谈文化传统的书，意在以文化谈人生，帮助人生、丰富人生、圆满人生。”王蒙所要实现并且已经实现的，就是将哲学寓言、圣人箴言、经典格言，与自己此生的体验、经验、实验贯通起来，进而融合、发酵、生成，凝结为可亲、可感甚至可触摸的人生智慧，从而产生启迪作用、导向功用、标杆效用，实现他在本书跋中所宣扬的“让文化回到生活”。

我们读到了慷慨无私的王蒙，他将人生体验中最精华的部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读者；我们读到了“青春万岁”的王蒙，他的思路依然是如此激荡，他的想象依然如此瑰丽，他的表达依然如此气势充沛、蓬勃飞扬，他思想的流量依然如此汪洋恣肆。当然，最为宝贵的，是我们读到了丰赡厚实、博古达今、纵贯中西的

海量储存，跌宕起伏、九死不悔的忍忍心性，超脱羁绊、睥睨尘寰、摒弃俗世的灵魂气场，将思考、张扬、创新永远放在第一位的自觉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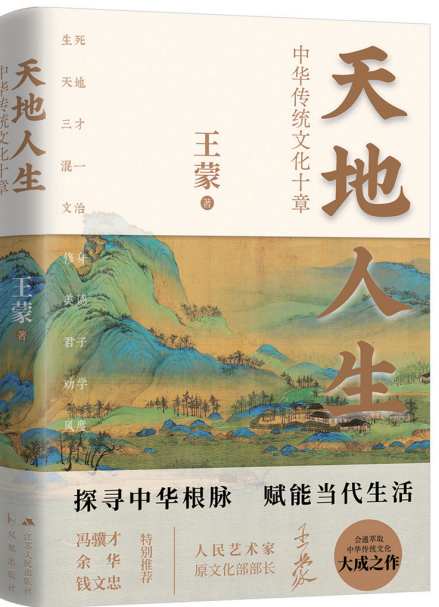
这里要说到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正常情形下，输入与输出是完全成正比的，学问研究、思想淬炼、创新创造，物质形态的和意识形态的，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都脱不了这个铁律。当然不排除小部分人靠优越的天资、机灵的大脑而有所成就，但是这条路能走多长、走多久，是要打问号的。偏偏中国文学界、文化界走出了王蒙，既天佑聪明，又勤勉如蜂，他的文学创作才能喷薄而出，为当代中国带来宝贵财富。

从表象上看，因为有海量涉猎作为支撑，就有了《天地人生：中华传统文化十章》信手拈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表达与阐述。从深层次看，王蒙是一位很有生活的作家，有形态丰富的人生体验，多数经典都可以让王蒙在丰富的命途中找到对应的点，这就使得经典对于王蒙来说，有了个体的“这一个”的意义，有了基于实践的消化与运用。在书中，王蒙将先验适用于体验，将体验凝练成经验，固化为人生宝典，和盘交付于读者，他用他自己的“让文化回到生活”教给世人如何“让文化回到生活”，这是本书的终极目的、任务和价值。

生活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我们无非采取三种态度：进取、妥协、和解。本书名为“天地人生”：天之下，地之上，人是绝对的主体，这个主体的活动叫做人生。从小说创作方面看，从最初的《青春万岁》到《春之声》《坚硬的稀粥》《活动变人形》再到《吻》以及近年的《笑的风》，王蒙一直行进在对主体性的认知、探索、丰富之路上。主体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进取，王蒙在跋中有一段非常直白的表达，既阐明了写作本书的初衷，又从文化的角度激活世人的奋发态度和踔厉气概：“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为了担当起随着时代发展而日益艰巨复杂化了的历史使命……实现传承、弘扬、创造性转变、创新性发展……实事求是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推进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贡献中华，贡献中华文化，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王蒙先生绝对担当得起“自强不息”这个词。他从《青春万岁》起步，就以冲刺的姿态，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随笔各个领域纵横驰骋，高潮迭起，构建了一个璀璨、博雅、厚实、丰赡的文化“王”国。他七八十岁的时候，依然活跃在各文学类文化刊物和文学排行榜上；而今快90岁了，还保持着很年轻的创作状态，学养、活力、韧性共同烘托着他坚硬的进取。“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王蒙当之无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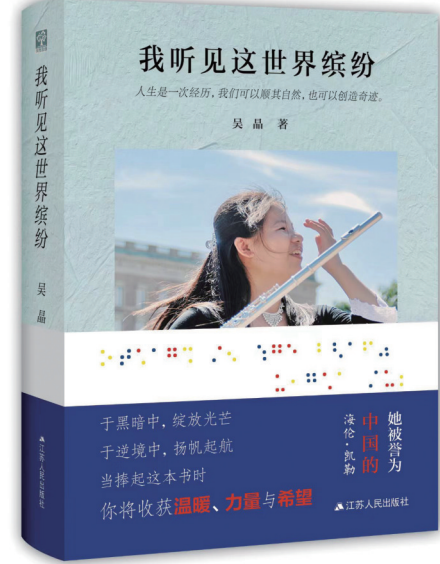
关于妥协，王蒙引用了相声演员方清平的脱口秀《长生不老》。这个脱口秀走的是荒诞现实主义的路线，其中的剧情是人人都实现了长生不老，终于活得不耐烦了，到了“求死不得”的地步，最后只能去恳请医生开两盒“伸腿瞪眼丸”。王蒙居然对这个“段子”情有独钟，又“泄露”了他研古而不迂的“青春本色”。当然，这个“段子”只是个引子，轻松地、巧妙地引导读者回到“道”的本原，在本书的第一章“生死”篇中，他非常认真、诚恳地启发我们：要学会妥协。“生老病死，生而后死，是天道，是大道，是大自然的不可变易的规律，是能够做到的就是好好活，健康地活，文明地活，尽可能快乐与有意义地活，尽量避免由于荒谬、迷信、愚蠢、压迫、剥削、失误而自损生活质量与寿命。”一方面，人们对生老病死要充分认同和无条件接受；有了这种妥协，人生就会豁然开朗，就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另一方面，妥协不是躺平，不是吞下精神鸦片，在科学性妥协的基础上，“人生值得努力过好，生活质量需要不断提高，人格需要完善再完善，喜怒哀乐值得去体验，艰难险阻值得我们去奋斗去克服，顺逆通塞都在考试试炼丰富充实我们的人生”。

和解也是一道人生大命题。和解是介于进取与妥协之间一种努力，一种“轻努力”“微努力”，是圆融、通达，是内在世界与外部环境角力之下水到渠成的自省和作为，是妥当、稳定的人生，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我的“黄昏哲学”》里，王蒙告诉大家：“老年又是和解的年纪，不是与邪恶的和解，而是与命运，与生命、死亡的大限，与历史的规律，与天道、



宇宙、自然、人类文明的和解。达不到和解也还有所知会，达不到知会也还有所感悟，达不到感悟也还有所释然，无端的非经过选择的然而又是由衷的释然。”学者们研究王蒙的小说，共同发现了王蒙将和解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梁振华、吴楠在《和解的视角与姿态》中写道：“王蒙及其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化/文学史上一个含义丰富的独特存在。结合纵贯其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实绩来看，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革命政治信仰、幽默豁达情怀等精神人格元素的相生相融，映衬着王蒙以‘和解’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立场。”房伟在《“历史和解”与“意识融合”的文学史张力》中也论及，王蒙的小说深刻“表现出全球化历史时期，中国文学在追求‘历史和解’与‘意识融合’基础上，再造民族文化叙事的努力”。在本书里，和解已不仅仅是一种态度、一种认识、一种哲学，王蒙刷新并提升了和解的内涵：“平衡和谐，不是靠吃瓜旁观、袖手躲避、隐瞒真心、敷衍对付……所能做到的。平衡和谐靠的是该争必争，能调整则调整，该忍必忍，可忽略则忽略，明明白白，无为无不为。”

本书分为生死、天地、三才、混一、文治、修身、美德、君子、劝学、风度十章，其中，天地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立足点和着力点，是我们出发和归来的永久根据地。王蒙告诉我们，天地衍生阴阳，阴阳涵盖万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类如何成全自身、完善自身、发挥自身，天和地都昭示我们了。



温暖的力量

《我听见这世界缤纷》读后 □王洪

感受到一种爱的力量，就是他们所给予吴晶最无私的父母之爱，这爱充满着温暖。

《我听见这世界缤纷》当然还包含着吴晶对爱的真切感受和理解。她用一节篇幅告诉人们“爱我幸福”，对于启蒙老师、运动教练、音乐导师、美国寄宿家庭的两位老人，二姑父、小姑妈以及大舅小舅等这些至亲，哪怕只是赛场上领跑员给她一次搀扶，都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里。她在写爷爷对她关爱的历程时，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她写到自己在南京与77岁的爷爷分别时，没有能力为爷爷购买大包小包的物品，只是买了一瓶矿泉水给爷爷带在路上喝。可直到2004年，吴晶从雅典残奥会回来看望爷爷，“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在爷爷家的柜子上，我竟然摸到了一瓶没有打开的矿泉水”。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真的为世间的朴素所感动，被这种爱的力量所折服。这样的事例在全书中非常普遍，而不是那种扭扭捏捏的刻意与煽情。我总在想，吴晶为什么一直耿耿于怀，想要为在南京外国语学校试读路上帮她过马路的4年级小男孩做点什么，以回报这个男孩的帮助，那一定是因为爱总是相互的。

在吴晶的心中，除了家人、亲人和友人给予她的爱之外，温婉的文字还告诉读者，她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的关爱。因为到处都有爱的芬芳，她才会获得爱的幸福和甜蜜。比如，她成为南京外国语学校历史上的第一个盲人学生，虽然她自己曾付出常人倍数的努力，感受到“两种力量的拉扯”，战胜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但是若没有社会这个温暖的怀抱，谁又能给她以温暖与安慰呢？在南外的日子里，她感到有四面八方的力量，从校内校外伸出援手，在帮助她、关心她，她说：“在南外读书的日子，我的心里充满了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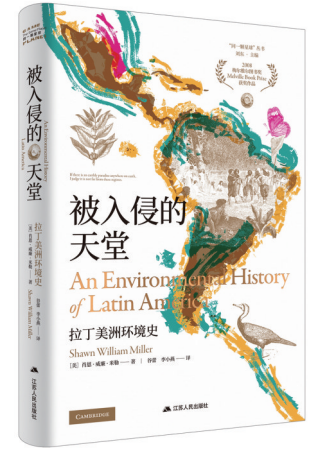
《我听见这世界缤纷》中，还有一种跨文化跨种族的爱。这在吴晶的叙事语境中是让人留恋和仰慕的。帮她在南外通过试读而取得入学资格的巴特先生，到飞越太平洋见到了有7年书信和邮件往来的诺玛奶奶，还有施奈德爸爸妈妈、瑞典盲人协会的奇基·诺德斯特伦女士……无论是在美国、日本、意大利，还是最后她落地在瑞典，都让读者感受到那种超越时空和种族观念的人类共通的爱。吴晶在21岁生日当天得到施奈德爸爸妈妈赠送给她的一根蝴蝶项链，随后一直带在身边，“就像一直带着他们给我的力量”。我们在触摸到吴晶沐浴着爱的时候，她叙述的“一段跨国的情谊”更令人向往。一个叫弗雷德的瑞典小伙子，与吴晶在邮件中相识。后来，他们在相处和互助中，也收获到一种朦胧的爱。但一种更崇高的使命感和更有约束力的情感，使他们理智地结束了这段难忘的关系。

作为长笛演奏家的吴晶，经常在音乐会上演奏莫扎特的《G大调长笛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吴晶仿佛会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这首庄严的乐曲中，她吹奏出的阳光般的旋律，表达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是她用生命谱写的，生命是有尺度的，爱是温暖的，温暖的爱才能给予人蓬勃的生命力量。

新书推荐·江苏人民出版社

《被入侵的天堂：拉丁美洲环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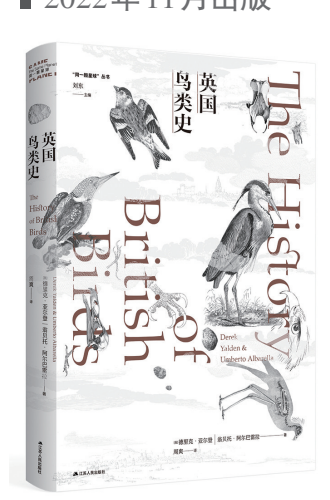
【美】肖恩·威廉·米勒 著 谷蕾 李小燕 译 2022年11月出版



本书展现了拉丁美洲600年动荡的环境史全景，并从环境的角度讲述拉美文明的变迁。从阿兹特克人的同类相食，到今天的墨西哥城中艰难呼吸，人类的态度和欲望在历史中占据绝对位置；同时，飓风、病菌、甘蔗、钻石等自然之物也扮演重要角色，在拉丁美洲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多年来，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较量从未停止。

《英国鸟类史》

【美】德里克·阿尔登 翁贝托·阿尔布雷拉 著 周爽 译 2022年11月出版



英国数量最多的鸟类，在考古记录中的分布也最为广泛。在沧海桑田的万年变迁里，它们留存有丰富的历史谱系。从地名来源到文学意象，从餐桌上的食物到被收藏的标本，鸟类与人类文明交互影响，无处不在。本书是一部英国鸟类史，也是一部英国文化史。作者以丰富的考古数据为依托，详述了鸟类骨骼的鉴定以及鸟类动物群的历史，并将其融于时代背景中。在1500年的历史长河里，英国鸟类的进化迭代尽显于神秘古老文化中。

这一代中国作家和历史学者或多或少都受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观照历史的大历史观以及用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的视角。新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振羽先生的传记新作《国家重器张之洞》，即是一部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张之洞，将其放在晚清大变局乃至世界大历史中加以考察的长篇传记，其史料之翔实、视野之宏阔、人物脉络之清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为晚清重臣，国之股肱，张之洞一生宦海沉浮，纵横官场数十年，历经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是晚清大变局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他的历史堪称半部晚清史。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作者并没有平均用力，而是从办学、军政、实业三个主要维度，在晚清错综复杂的时代风云中刻画这一历史人物形象。张之洞出身官宦之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1863年进士及第，以探花郎的身份进入翰林院。1867年，刚刚而立之年即担任湖北学政。张之洞一生对人才和教育特别重视，充分意识到“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环球各国竞争，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因此，每到一地任职都以办学为要。1869年在武昌创办经心书院；1874年任四川学政时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1886年在广州任两广总督时创办广雅书局，次年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1893年，任湖广总督时，在武汉创办自强学堂，其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的前身；即使临时署理两江总督，也主持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与李提摩太的相识对张之洞一生影响甚深，在李提摩太影响下，张之洞开始具有西方法律意识和世界眼光，力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除了办学培养人才，他还不拘一格举荐人才。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正式开始变法维新，张之洞遵旨保荐陈宝琛、黄遵宪、傅云龙、钱恂、郑孝胥等人，后又力荐杨锐、刘光第等15人。为了起用梁鼎芬，甚至不畏流言，甘冒政治风险。即便人生最后一刻，他念兹在兹的仍是“用人育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

张之洞并不是一个军事家，但他对军事、国际政治和军队建设的关注远超一般军中将领。这一方面源自他早年协助父亲办理军务的经验，另一方面得益于他对西方先进军事革命和世界形势的洞察。虽然他并没有直接涉场点兵，却凭借远见卓识，积极应对世界军事变革，大胆起用军事人才，署理两江总督时，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大胆起用冯子材，最终取得镇南关大捷，对刘永福也大力支持。年轻军官黎元洪由于他的大胆使用脱颖而出，后来曾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对中日甲午战争、沙俄入侵东北、八国联军侵华对国家的严重影响都有着远比一般朝臣更清醒的认识，不仅显示了他的世界眼光，更体现了他对世界军事政治大势的洞见与卓识。

张之洞不只是个“清流派”官员，更是一个改革者，改革意识贯穿了他的一生。他与刘坤一奏陈的12条，从治、富、强三个方面强调了改革的必要性。他认为变法必学西方，不学西方就是换汤不换药：“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东北三省对国家的重要性，他有着独到的认识，认为：“非存满洲，不能存中国。”任何改革都必须着眼全局，面向世界，为了拓宽视野，了解国际形势，他不仅吸收大批中国精英，还大胆聘用洋人，以及包括辜鸿铭这样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为他全方位的改革做好了知识和人才上的准备。

张之洞并不是一个空头改革派，而是身体力行的实业家。在他的主持下，找铁矿、挖煤矿、办钢铁厂、修铁路、开织布局、办兵工厂和学校、研究农业、发行书刊等等，用实际行动与探索成为晚清著名的洋务先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张之洞，就没有芦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在遗折中念念不忘完成粤汉铁路建设。

作为一个文史学者和作家，振羽嗜古成癖，博览群书，办公室书刊堆积如山，大部分时间他就深藏在书山之间终日与书为伍，读书、索书、评书、写书，成为他生活的日常。最令人叹服的是，他不仅阅书无数，且博闻强记，拥有常人少有的记忆力，对名人野史掌故更是如数家珍。本书大量引用奏折、书信、文章、电报、回忆、条陈、文摘等等，旁征博引，几乎无一事无来历，甚至细到某一天、某一个人、某件小事。如中日战争时，大量引用战况电报；为了厘清张之洞与盛宣怀的关系，准确梳理出张之洞一生共写给盛宣怀书札11通。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一生交往无数，书中涉及人物众多，重要历史人物如走马灯似的穿梭其间，作者凭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厚功底，对涉及到的每一个历史人物都详细交代来龙去脉，如张佩纶、黄体芳、唐景崧、盛宣怀、刘坤一等，用工笔画的手法为读者详尽地描画出了一幅晚清历史人物关系的全景图和人物历史谱系，显示出作者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史料功夫。

作为“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一生“不树党援、不植生产”，但并非李鸿章讽刺的“书呆子”一枚，作者写出了其清流外表下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真性情。比如在广州期间，他以退为进，逼走巡抚倪文蔚。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对故人之子十分关心，曾专门给学生梁鼎芬写信嘱其关照。从两江总督府回武汉，途经芜湖时，专门吊祭因直谏反对用义和团盲目排外而遭清廷处死的得意门生袁昶，并赋诗4首，其中有“千秋人痛冤家令，曾为君王策万全”之句，以此表达惋惜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曾冒曾政治风险致电盛宣怀力保学生杨锐，但最终仍未能改变杨锐喋血菜市口的命运，此事令他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在鸡鸣寺建造豁蒙楼，以此含蓄表达对杨锐的永久纪念，其真性情于斯可见。

作为历史人物，张之洞自然有他的局限性，作者对此也秉笔直书。公车上书时，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康有为等人以为“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甚至希望关键时他能力挽狂澜，但最终张之洞并未能如维新派所愿。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张之洞也是站在清政府立场力主剿匪。在对外关系上，虽然他反对“主权全失”，对李鸿章的软弱不满，但并没有进一步的举措。他已经意识到日本染指中国的野心，却天真地给日本近卫笃磨写信，奢望联手日本抑制沙俄对东北三省的侵占，反映了他天真的性格和书生意气。

作为大清重臣，张之洞可谓鞠躬尽瘁，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即使到了生命的终点，他在最后的奏折中仍在关心着国家图书馆的建设，希望“以保国粹而惠士林”。口授遗折时，不无遗憾地慨叹“惟时局艰虞，未能补救，累朝知遇，未能仰酬”，仍在进言“至用人育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人之将死，其言也悲，读来令人动容。

对后人来说，历史永远是一面镜子。作者把张之洞放在晚清官场和时代坐标中，从大视野大格局中剖析这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用现代意识重新审视张之洞一生的改革得失，对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当下中国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江苏人民出版社 logo and QR code for WeChat public account.

晚清改革者张之洞

□汪修荣

